◆纵　横

互联网模式不是创业成功的保证

近年来，O2O行业不断创新，其平台属性使服务的提供者和需求方高效对接，发展势头迅猛。但假期“断挡”的行业状态表明，搭建平台并不必然走向成功。O2O行业“用工荒”，也是当前互联网模式创业创新全业态遭遇“寒冬”的缩影。

最先到来的是已经被业界认真讨论的“资本的寒冬”。以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为例，因为行业泡沫、资金链断裂，数十家创业公司停电歇业；在深圳，知名创业孵化器“车库”倒闭，不少创客空间深陷同质化、恶性竞争的危险。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其内部年会上曾表示：“2016年中国的创业会经历一次寒冬，会有60%到70%的创业公司死亡。”此话并非危言耸听。

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并逐步落地实施，O2O行业正在与实体经济进行深度融合，并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对经济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影响也不断加深。一时间，在线服务商此起彼伏，市场当中许多不健康因素在互联网创业的这股热潮下隐蔽着。一方面，经过多年拷贝式发展，众多互联网创业项目堆积出O2O式的虚假繁荣。另一方面，行业雷同模式迫使企业单纯靠烧钱、砸流量获取用户。而一味追求行业老大位置以争取更多资源，则造成了不少恶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当经济形势向好时，融资便捷、需求畅通，市场缺陷尚可以得到规避，但当市场扩容遭遇瓶颈，资本谨慎、需求萎缩，各种不健康因素就会纷纷暴露。

虽然一度被看作国内市场创新的灵丹妙药和经济发展新引擎，但互联网模式并非创业创新成功的保证。如果没有符合市场真实需求的项目，不在专业技能方面提高核心竞争力，不转变服务思维，仅靠烧钱、拉人，既难以开拓市场，也无法赢得长久的用户群。资本方和管理方也应该认识到，风投互联网时代存在的巨大泡沫，必须在接下来的实业互联网时代彻底挤出。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只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是人类社会的需求，也只有真正对社会产生价值的项目或商业模式，才是值得关注、扶持和投入的。

“风来了，猪都会飞起来。”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句名言。但风停了呢？只要是猪，不管贴多少“互联网+”的条子，结局也是“摔下来死得更快”。（2016年2月19日《光明日报》许云泽）

应制定“改革促进法”

应该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把腐败跟改革过程中的试错分开来。因为改革一定要有试错，不让他试错，那怎么改革？人不是上帝，没有人可以保证我做的事情百分之百能成功，百分之百不失败。改革中的试错不是腐败。行政过程要公开透明，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错误，也不是腐败。如果能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500多条改革，我们要改什么，这些改革需要哪些法律、法制条件，制定一个改革促进法，下一步就可以把中央政府跟下面的四条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重新调动起来。（2016年2月22日《北京日报》郑永年）

◆观　点

如何冲破“问责尴尬”的藩篱

问责制是在实践的倒逼下开始萌生的。一段时间里，疾风骤雨式的问责，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收到了肃整社会流弊、震慑行政违法、恢复社会秩序的效果。但是，一方面，我们缺乏一套可操作性的、明确的问责标准来定性和定量分析行政过错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替而代之的是一些模糊、原则性的规定；另一方面，问责制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严肃问责来教育挽救责任者本人，并可以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实现制裁与教育的双重功能。在实践中，问责制的责任预防功能并没有清晰显现。

我国不少地方或单位的问责规定并不是从本地方、本部门的实际需要出发的，而是觉察到问责是一股时代潮流，于是将问责的制度文本当作其“形象工程”的一部分。从现实来看，“纸面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存在较大距离，问责在很多时候还过度依赖于舆论的驱动，网络曝光、媒体爆料等非常规手段充当了重要角色，而缺乏源于“掌握权力就要承担责任”的逻辑驱动。对于问责对象，别说是法律制裁，有时连轻微的纪律处分都没有；相反，某些地方官员通过不应有的行政过错可能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收益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些现象不仅可能削弱问责的力度，加剧官员机会主义选择的频率，而且直接催生更多的“问责秀”、假问责等劣质公共行政生态问题。

问责是现代政府强化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问责制度从建立到发挥作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冲破问责尴尬的藩篱，在既有政治格局中实现有效的制度平衡。

化解问责的尴尬，必须通过制度建设科学配置权力，确保权力运行公开、透明、规范，进一步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注重抓好法规制度的系统配套，特别是注意保持制度建设与责任追究政策、法规的有机统一，保持上下位制度和同位阶制度之间的衔接匹配。

在问责的具体实践中，问责尴尬的有效化解，关键在于各利益攸关方乃至社会公众的积极监督。真正有效化解问责的尴尬，必须建立起透明公正的监督体系，确保问责行为合法、程序合法和方式合法。

在问责效果的利弊权衡中，必须正确理解制度的刚性穹顶。面对复杂的国情和繁重的政务，必须依法行政，创新服务，稳中求进。为正向激励官员有效作为，对于锐意创新的官员应该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对于在行政过程中非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犯错的，应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责任追究。但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责任减免须是在法律框架下的责任减免，是服务于法治国家建设的责任减免。（2016年1月18日《理论周刊》王仰文）

中美智库的差距有多大

中国古代早有“门客”“军师”“师爷”“幕僚”“谋士”等与智库相似的职业，但现代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198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目前中国两家最大智库的创建史，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决策机制改革的进程。但两家均属于行政编制内的机构，很难摆脱“官方”印迹，“谋”与“断”之间未能分离，即参谋体系与决策体系之间未能相对独立，这为民间智库的萌生与发展提供了政治与历史土壤。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的“下海潮”，一批官员和学者毅然走出体制，创办了依靠市场、专注于政策分析和企业咨询的民间智库，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等。据报道，当时中国智库一度达到2500多家。然而，由于苏东剧变对中国持续产生的意识形态压力以及商业运作模式的不成熟，不少民间智库被注销或夭折，有的则转为商业咨询公司。整体上看，第一代中国智库以官方智库为绝对重心，民间对决策咨询的参与度相当低。

北京奥运后，行政体制改革加快，第二代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有的效仿国外智库模式，邀请了大量政府前高官为智库管理者，如成立于2009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有的靠民营慈善基金投资，如成立于2011年的新华都研究院；有的则依赖各地政府或企业，专为地方决策服务；有的则依托著名高校、知名媒体。人大重阳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2013年初联合创办的现代化智库，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第二代中国智库，相较于第一代，呈现了许多新特征：机制相对灵活，不再寻求行政编制；经费预算大多源于社会捐赠，而非行政拨款；观点与立场更加多元，有的干脆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等等。但第二代中国智库与美国的差距仍然较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

一是产业规模。美国智库大约发端于一战以后。“智库（think tank）”这个词组就是起源于一战中用于大规模使用的“坦克（tank）”，即思想也有像坦克那样的威力。布鲁金斯学会等著名智库均有近百年的历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智库已达近2000家、年均预算达到数百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十万的产业规模。而现代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横向比较，中美智库发展阶段大体仍有30—50年的差距，差距的背后是国家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从这点看，中国智库从业人员还需要兢兢业业、奋勇向前。

二是运营机制。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智库的发展与壮大，伴随的是美国民主化进程、美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崛起进程。尤其是二战前后，美国抓住历史机遇，一跃超过诸多强国，在整个国际体系中一枝独秀，智库在背后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冷战时，美国智库的作用同样明显。美国智库的大崛起，伴随着智库与政府、与媒体、与社会关系的磨合，以及智库内部运行机制（包括筹款、人员管理、项目运营等）的完善和思想市场体制的形成。相比之下，中国智库业确实还处在初级阶段，且远远落后于国家发展。不少中国智库还不知道怎样与决策部门沟通共处，一些中国民间智库的生存还存在严重问题，很多中国智库的激励制度还没有建立，智库在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营体系中还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智库仍然需要虚心向美国求教运营之道，借鉴相关成功经验，并将之与中国本土实际结合起来。

三是机构影响。笔者曾在《“伐谋”，智库必须有的对外功能》一文中论述过美国智库是如何做到对外传播与营造影响力的。换句话说，智库就像是“思想工厂”，影响力与对外传播就像是产品的销售能力。中国智库目前最缺的，还不只是产品质量，更是产品的营销。与美国智库比较，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差距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大，中国智库最优秀学者完全有实力PK美国最优秀的智库学者。两国真正的差距在于对智库思想的整体营销力，包括项目设计、调研、撰写、评估、报送、传播、社会文化、政治结构等各个环节。中美智库差距很像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差距，不在于单个演员的实力，而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不足进而导致整体产业的落后。（2016年第1期创刊号《智库理论与实践》王文）

◆评　论

「简除烦苛 禁察非法」的深意

“简除烦苛，禁察非法”，最早出自《后汉书》的这句话，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据报告起草组负责人透露，这句表述是由李克强总理亲自加入的。

从去年的“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到今年的“简除烦苛，禁察非法”，总理已两次将他赞同的话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其实，这两句话的核心意思都是简政放权。特别是“简除烦苛，禁察非法”，有两层含义：一是除去那些烦琐的规章制度，二是禁止部属扰民等不法行为。

简政放权，被称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据统计，在本届政府召开的前100次会议中，有65次提到“简政放权”，40多项议题与简政放权直接相关。最具说服力的是，三年来，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大量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本届政府承诺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审批事项的目标，提前两年多完成。

这是看得见的成绩，更是让人感受得到的效果。办公司，变容易了；办事跑断腿磨破嘴的现象，越来越少了；“你妈是你妈”等奇葩证明被砍掉；美甲师资格鉴定被取消……见诸媒体的一个个案例，无不说明简政放权在动真格，谋实绩。

当然，简政放权就像“割自己的肉”，放弃权力就等于放弃利益。对某些单位来说，多一道审批门槛，就多一个揩油的机会，这也注定了简政放权会遭遇阻力。于是，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上动下不动、头转身不转”的现象，还有一些部门阳奉阴违，明放暗不放，或者象征性放权，这说明应加大督查力度，防止简政放权走过场。

还要看到，放权不等于放手不管，也不意味着监管机构就能当甩手掌柜。李克强强调放管结合，要让政府有更多的精力来完善和创新宏观调控，尤其是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换言之，该放的一定要放到位，该管的一定要管好，如果该放的不放，该管的不管，就误读了简政放权。

仔细体味“简除烦苛，禁察非法”，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了简除烦苛。殊不知，禁察非法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最近就有一个案例，媒体曝光财政部驻北京监察专员办事处一官员，带队检查某上市公司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向该公司董事长提出借款1000万元。遭拒后，向该公司发文作出处罚。这样扰民的官员并非多数，但性质极其恶劣。简政放权，既要放权，更须将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

开弓没有回头箭，简政放权已处于啃硬骨头的阶段，面临的挑战更大，但不会画上句号。按照李克强的说法，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将简政放权进行到底，让权力不必乱伸手，也不敢乱伸手，让市场更有活力、让社会更有创造力，这正是“简除烦苛，禁察非法”在当下的深刻意义。（2016年3月5日《京华时报》王石川）

◆史海钩沉

康熙的用人之道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的一天，两江总督于成龙向皇帝提了个过分要求。报告寄出后，于成龙既满怀期待，又感到不踏实。

几天前，江宁知府陈龙岩不幸病故。于成龙推荐比自己小22岁也叫于成龙的一个人。

按照大清的干部制度，地方官出缺的，地方首长敦请朝廷补充干部不是问题，但指名道姓、指定岗位，还要由从五品越级提拔到从四品，则严重违反规矩，十分犯忌。如果皇上不理解不支持，后果会很严重，因此这份报告很费脑筋。

他写道，陈龙岩忠诚可靠、廉洁自律，协调各方、服务大机关、掌控财政和支援军队样样得心应手。老陈去世后，他顿感失去了左右手，而在两江辖区内，尚未发现合适人选。言下之意，继任者应该像陈龙岩那样德才兼备才行，否则两江地区的工作就会受影响。

铺垫既已完成，于成龙亮了底牌：恳请皇上特事特办，召集各大臣开会讨论，现场推出合适人选。

在报告的末尾，老于成龙巧妙地点了一个人：有皇上关怀，像通州知州于成龙那样的好干部，一定会脱颖而出的。推荐小于成龙是报告的核心，康熙帝那么智慧，过得了关吗？

于成龙动了吏部的奶酪，吏部自然不爽，话说得很在理：打破常规不是不可以，但那些排着队等抽签的干部怎么看？再说，“廷臣会推”知府这一级干部，没有规定，没有先例，还是照章办事为宜。

康熙帝浏览了报告，微微一笑，当场拍板：这事拖不得，抽签、“廷推”都来不及了，让通州的小于赶紧去吧。于是，一个江宁城有了两个于成龙，一时成为美谈。

吏部大跌眼镜只是开始。小于到任后干得风生水起，官民口碑极佳。两年后，对他有知遇之恩、被康熙帝命名为“天下第一廉吏”的老于积劳成疾，溘然长逝。江宁城里议论纷纷：小于的前途到头了。

不久，康熙帝到江南考察干部，亲笔题词送小于，明确告诉他：以你的级别不应享有此等荣誉，但大家都反映你廉洁有为，所以这是你应得的。临行，叮嘱小于永葆本色，不负老于厚爱。不久破格提拔小于为安徽按察使，正三品。两年后，小于也成了直隶巡抚，然后是左都御史，直至累死在河道总督任上。

康熙帝全盘支持于成龙的人事方案，是有深刻背景的。对此，老于比吏部看得准，所以才敢打那样的报告。

康熙帝上任的时候，明朝覆亡、清朝入关才十几年。他的父亲顺治帝24岁就去世了，稳固政权的任务落到他身上，而他的志向更为远大。从哪里入手呢？经过长期观察，康熙帝发现官场现状与他的政治理想很不匹配，必须先抓吏治。

在康熙任内，共有五百多名腐败分子受到法律制裁，六千名无能、无为、不适合行政工作的大小干部，分别被免职、降级或辞退，前无古人。

康熙的另一手是全力扶持清官能吏，鼓励忠诚担当。这一手运用得出神入化，出牌不按牌理，像魔术师一样让人惊讶不已，这是康熙治吏的最大特点。

一是下功夫挖掘有培养前途的清官能人，安排使用不拘常规，建立了崭新的用人导向。

康熙帝在帝王生涯中，公开表彰、重用、破格提拔干部达七百多人，两个鞠躬尽瘁的于成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老于成龙是明末贡生，属于政治上有瑕疵的干部。在短短数年内，康熙帝将他由七品知县，一路超擢到封疆大吏，理由就是他又干净又苦干。官员们看到了官场新风向，明白前途在自己手上。

早在直隶巡抚任上，老于便发现通州知州小于是个干净干事的好苗子，多次褒奖和推荐他。爱屋及乌，康熙帝对小于一直留心观察，迟早要用的。君臣三人以事业为重，配合默契，传导正气，引领各级官员向善向上，是沉甸甸的康乾盛世的一缕轻盈花絮。

二是培育正气，为清官能吏遮风挡雨，决不让好人受气。

在封建官场上，好人受气坏人神气的故事史不绝书，在康熙朝却少见。康熙帝第五次南巡下榻江宁的龙潭，赫然发现床上有一摊蚯蚓粪。这下完了！大家都为江宁知府陈鹏年捏把汗，因为他负责接待工作。康熙帝不动声色，工作间隙问一个孩子：江宁有好官吗？这孩子说：有啊，陈鹏年。

经过进一步调查，康熙帝弄清了真相。两江总督阿山打算向百姓增加赋税，陈鹏年死活不执行，多次据理力争，阿山便把他支去龙潭给皇上搞后勤，一为调虎离山，二为等着他犯错误。按照老习惯，皇上身边工作人员悄悄向这位地方官要钱，他假装听不懂。于是，蚯蚓粪便到了皇上床上。后来陈鹏年入武英殿，升河道总督。

被康熙帝越级提拔为巡抚的陈傧，独自背着破被子骑着老马上任，负责迎接的下属找不到新领导。老陈一到任就聚焦作风问题，集中处理了一大批鱼肉百姓的官吏，有人便开始告状。康熙帝马上表扬陈傧：人家的做官格言是“拿一个等于贪千万”，这样的官儿太少了！

三是深知人无完人的道理，注意保护干事创业积极性。

官员也是人，是人总会犯错误。康熙帝治病为了救人，改了就是好干部，努力把人引向正道。吴江县令郭琇曾被迫给领导送过钱，经教育洗心革面，变成江南最好的县令，康熙帝便调他进京从事监察工作。“铁面御史”郭琇既忠诚又担当，将权倾朝野的“大老虎”明珠拉下马来，被越级提拔为湖广总督，功勋卓著，堪称一代名臣。

小于成龙在治河问题上决策失误，与同事产生了激烈争执，最终造成了一定损失。事后小于很后悔，向皇上作检讨：这件事我错了，下回按人家的办法来。皇上谅解了他，让他继续负责水利建设。结果只用短短三个月，小于便把桀骜不驯的浑河、无定河治理得服服帖帖。康熙帝很高兴，给这条河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永定河。

经过一个甲子的不懈努力，康熙的清官能吏队伍蔚为壮观，史上少见，除了刚才提到的，还有张伯行、范承勋、格尔古德、赵申乔、彭鹏等等，名单很长很长……

康熙皇帝恰恰抓住了这个牛鼻子，把锄草与施肥、“拔烂树治病树”与“植树造林”统一起来，涵养了良性循环的官场生态，形成了群贤毕至的“清官现象”、见贤思齐的马太效应，天下英雄齐心合力，终于推开了通向辉煌时代的厚重大门，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闪亮钥匙，我们应该仔细端详。（2016年2月22日《中国纪检监察报》习骅）